

以高水平开放赋能浙江新发展

毕吉耀

浙江省新春第一会强调“推进高水平对外开放,建设高能级开放强省”。随即,省委、省政府在义乌高规格召开动员部署会,要求聚焦“能级提升、改革突破、模式创新”集中发力,更大力度深化义乌国际贸易综合改革,建设中欧班列集结中心,持续巩固全省“东向依港出海、西向依陆出海”对外贸易发展格局。浙江坚决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考察浙江时提出的“要在深化改革、扩大开放上续写新篇”的要求,顺应时代潮流、立足浙江实际,积极探寻高水平开放的路径和策略。

浙江开放发展的坚实基础与显著优势

改革开放40多年来,特别是党的十八大以来,浙江在对外开放进程中积累了雄厚基础,形成了诸多显著优势,为扩大高水平开放奠定了坚实根基。

浙江拥有强大的开放平台与优越的基础条件。宁波舟山港作为全球重要港口,货物吞吐量位居世界前列。其在大宗商品运输方面地位举足轻重,油气、铁矿石、粮食等物资的运输与储备能力强大,有力保障了国内能源资源供应,是我国双循环体系中重要的物流枢纽。

陆路开放通道独具特色。在“一带一路”倡议推动下,义新欧班列从义乌出发,连接起中国与欧洲市场。义乌小商品城作为全球知名的商品集散中心,依托义新欧班列,拓展了陆路贸易渠道。市场采购贸易这一创新模式应运而生,它以义乌小商品贸易为基础,结合跨境电商发展,打破了传统外贸模式的局限,为中小企业参与国际贸易提供了便利途径。这种贸易模式不仅丰富了我国外贸业态,还提升了浙江在全球贸易网络中的地位,使浙江成为我国陆路开放的重要窗口。如今,深化义乌国际贸易综合改革和中欧班列集结中心建设,将进一步强化这一优势,推动义乌市场从传统贸易形态向数字贸易生态跃升,持续做强跨境陆港枢纽。

浙江自贸试验区各片区协同发展,成为对外开放的重要引擎。自贸区在制度创新方面先行先试,对标国际高标准经贸规则,在投资便利化、贸易自由化、金融开放等领域开展了一系列探索。例如,在舟山片区探索大宗商品贸易投资自由化便利化改革,在跨境电商领域创新监管模式,这些创新举措为浙江吸引了大量国内外优质资源,推动了产业升级与经济结构优化,提升了浙江在全球经济治理中的参与度。

浙江民营经济活跃,产业基础雄厚。众多民营企业市场竞争中不断发展壮大,具备较强的国际竞争力。这

些民营企业不满足于国内市场,积极寻求海外发展机遇,在全球范围内配置资源,拓展市场空间。它们在技术创新、品牌建设、市场拓展等方面的实践,为浙江高水平开放注入了活力,成为浙江开放发展的重要微观主体。

浙江高水平开放面临的挑战与机遇

当前,全球经济形势复杂多变,贸易保护主义抬头,部分国家设置贸易壁垒,提高关税、实施进口限制措施,对浙江传统优势产业出口造成冲击。同时,全球产业链供应链正在重塑,浙江作为全球产业链的重要一环,面临着产业链外迁、供应链中断等风险。在高端制造业领域,浙江企业面临着来自发达国家的技术封锁与竞争压力;在劳动密集型产业领域,又面临着东南亚、南亚等地区低成本国家的竞争。此外,国际金融市场波动加剧,汇率不稳定、资金流动受限等问题,增加了浙江企业海外投资与贸易的风险。

在稳步推进制度型开放上,浙江还需聚焦改革,争取更大突破。尽管浙江在自贸试验区建设等方面进行了制度创新探索,但与国际高标准经贸规则相比,仍存在不小差距。在大宗商品交易领域,浙江虽然具备建立国际化交易市场的基础,但在期货交易市场建设、保税交割、金融开放等方面,仍受现有体制机制和政策法规等方面的制约。同时,在数据跨境流动、知识产权保护、竞争政策等新兴领域,浙江也需要进一步完善相关制度,以适应全球经济数字化发展的趋势。

随着全球经济数字化转型加速,数字贸易成为国际贸易发展的新趋势。浙江在数字经济领域发展领先,在跨境电商、海外仓建设等方面成果显著。浙江应充分利用这一优势,加快发展数字贸易,推动贸易方式创新。通过建设数字贸易平台,整合供应链上下游资源,实现贸易流程数字化、智能化,提升贸易效率与竞争力。同时,借助数字技术拓展贸易新领域,如数字服务贸易、跨境电商直播等,培育新的贸易增长点。此次深化义乌国际贸易综合改革,也强调了加速破局“买全球”,集聚跨境数字贸易新主体,培育数字贸易新业态,这将进一步推动浙江数字贸易的发展,使其在全球数字贸易竞争中占据更有利地位。

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为浙江拓展国际市场提供了广阔空间。浙江作为“一带一路”建设的重要参与者,通过加强与沿线国家的基础设施互联互通、贸易投资合作,进一步提升了在国际经济格局中的地位。此外,区域全面经济

伙伴关系协定(RCEP)的生效,为浙江拓展与亚太地区国家的贸易投资合作创造了更有利的条件。浙江应抓住这些机遇,优化市场布局,扩大对外贸易与投资规模。持续推进中欧班列集结中心建设,进一步强化浙江在“一带一路”建设中的节点作用,提升其国际市场的影响力和辐射力。

浙江高水平开放的破局之路

面对复杂多变的外部环境带来的挑战与机遇,浙江应以“高水平开放”为引领,从多个维度发力,实现开放型经济的高质量发展。

充分发挥自贸试验区的制度创新引领作用。浙江自贸试验区应继续对标国际高标准经贸规则,在投资准入、贸易便利化、金融开放等领域开展更多先行先试。在投资准入方面,探索实施更加开放的负面清单管理模式,放宽市场准入限制,吸引更多外资企业参与浙江经济建设。在贸易便利化方面,优化海关监管流程,推进“单一窗口”建设,实现各部门信息共享,提高货物通关效率。在金融开放方面,争取开展跨境金融业务创新试点,推动人民币国际化进程,为企业跨境贸易与投资提供更加便利的金融服务。同时,加强制度创新的系统集成,形成可复制、可推广的经验,为全国深化改革、扩大开放提供借鉴。

利用数字化转型优势优化开放环境。依托企业运营成本。加强跨境电商平台建设,完善跨境物流配送体系,提升跨境电商服务质量。鼓励企业开展数字化营销,利用社交媒体、直播平台等拓展海外市场。同时,推动数字技术在金融领域的应用,发展跨境数字金融服务,为跨境电商企业提供更加便捷的支付、融资等服务。

加强内外联动,提升开放平台能级。加强宁波舟山港与内陆港口的合作,通过海铁联运、水水联运等方式,拓展内陆腹地,提升港口集疏运能力。加强与义乌小商品城等市场的联动,实现海陆与陆路贸易通道的有机结合。推动国内其他地区优质产品通过浙江开放平台走向国际市场,将浙江打造成为国内国际双循环的重要枢纽。同时,积极参与全球港口合作,加强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港口的互联互通,提升浙江港口在全球航运网络中的地位。围绕中欧班列集结中心建设,统筹推进大规模“硬建设”和高水平“软建设”,一体推进平台能级、枢纽能级、服务能级提

升,推动港务、关务、船务一体化发展,推动海外仓和国内仓一体化运作,促进港产港贸港城一体化,形成外联内畅、便捷高效的“枢纽+通道+网络”整体布局,进一步提升浙江开放平台的能级,增强其集聚和辐射能力。

围绕舟山港大宗商品集散地建设,推进制度型开放。在大宗商品交易领域,争取国家支持,开展大宗商品期货交易市场建设试点。完善相关配套制度,解决保税交割、仓储设置等问题。加强金融开放创新,吸引国际金融机构参与大宗商品交易市场建设,推动资金跨境流动便利化。积极引进金融人才,为大宗商品交易市场发展提供智力支持。通过建立国际化的大宗商品交易中心,提升浙江在全球大宗商品市场中的定价权与话语权,增强我国在国际资源配置中的影响力。

推动贸易创新发展,拓展国际市场空间。继续发展市场采购贸易、跨境电商等新型贸易模式,推动贸易方式多元化。鼓励企业开展跨境电商B2B业务,拓展海外销售渠道,推动企业设备、中间品等出口。加强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和RCEP成员国的贸易合作,优化贸易市场布局。支持企业参加国际展会,提升浙江产品的国际知名度与品牌影响力。同时,加强贸易摩擦应对机制建设,帮助企业应对贸易保护主义挑战,维护企业合法权益。持续完善市场采购贸易,创新发展进口贸易,壮大以跨境电商为代表的数字贸易,进一步推动浙江贸易创新发展,拓展国际市场空间。

促进民营经济国际化发展,提升产业竞争力。加大对民营企业“走出去”的支持力度,提供政策咨询、金融支持、风险预警等服务。鼓励民营企业开展海外投资并购,获取先进技术、品牌与市场资源。支持民营企业在海外建设生产基地、研发中心,提升其全球产业链布局能力。引导民营企业加强技术创新与品牌建设,提高产品附加值,增强国际竞争力。推动民营企业参与国际标准制定,提升在全球产业分工中的地位。

加强与上海的协同发展,实现优势互补。主动对接上海,加强在港口、金融、贸易等领域的合作。在港口协同方面,加强宁波舟山港与上海港的分工协作,实现资源共享、优势互补,共同打造国际航运中心。在金融领域,借助上海国际金融中心的优势,加强金融创新合作,推动金融服务实体经济发展。同时,发挥自身特色优势,如大宗商品交易、跨境电商等,与上海形成差异化发展格局,共同提升长三角地区在全球经济格局中的竞争力。

【作者为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宏观经济研究院原副院长】

(本报记者 吴晔 整理)

不断增强教育、科技、人才融合发展

骆 微

科技强国,从而在国际竞争中赢得先机。

就人才而言,其核心任务是在国家层面统筹协调各项人才工作,以系统化的方式推动人才培养、引进、发展和管理,从而支持国家人才强国战略的有效实施。这一战略的重点在于进一步深化和一体推进人才培养、引进、流动、评价、激励等机制改革,以确保人才能够满足国家和地方经济社会发展的需求。具体而言,包括建立和完善多层次、多渠道的人才培养体系,提高本土人才的整体素质和创新能力;制定灵活多样的人才引进机制,吸引海外高层次人才回国服务或参与合作;优化人才流动机制,促进人才在国内不同地区、行业之间的合理配置;建立健全科学公正的人才评价体系,确保人才能够得到合理的评估与认可;制定有效的激励措施,激发人才的积极性和创造性。

增强教育、科技、人才融合发展的要素耦合性。推进教育与科技的融合。教育,作为知识传授、能力培养和价值塑造的主要途径,其质量和效率的提升,离不开科技手段的有力支撑;而科技,作为推动社会进步、经济发展的核心动力,其持续的创新发展,则离不开教育所培养的高素质人才之积极参与和贡献。

推进科技与人才的融合。科技创新不仅需要具备深厚专业知识的人才,更需要具有创新思维、跨学科能力、良好沟通能力和团队协作精神的高素质复合型人才。同时,科技也为教育提供了先进的教学手段和工具,使得教育内容和方式更加丰富多样,提高了教育的质量和效率,为人才的实践锻炼和创新能力培养提供了广阔的平台。

推进教育与人才的融合。教育通过知识的传授、技能的培养和价值观的引

导,为人才的成长提供了坚实的基础和广阔的空间。而人才的培养,则需要紧密适应教育的发展方向和需求,不断调整和完善自身的知识结构、技能水平和综合素质,以适应不断变化的社会环境和产业需求。

增强教育、科技、人才融合发展的过程联动性。过程联动强调教育、科技与人才之间的互动与反馈,以实现三者的协同发展。在这个联动机制中,教育、科技与人才不再是孤立的要素,而是构成一个相互依存、彼此促进的系统。教育为社会提供知识和技能的培养,科技则为社会发展提供创新和技术支持,而人才则运用所学的知识与技能来推动科技进步,从而形成一个良性循环的互动过程。

教育是这一联动机制的基础。通过系统的教育,人们能够获得必要的知识和技能,这些知识和技能不仅包括传统的学科内容,还包括创新能力、批判性思维、团队合作等现代职场所需的综合素质。教育机构通过与科研机构和合作,不断调整和优化教育内容,以适应社会发展的需求。

科技是这一联动机制的创新引擎。科技创新不仅推动了社会生产力的发展,还为教育带来了新的工具和方法。例如,信息技术的应用使得远程教育成为可能,大数据和人工智能技术则为个性化学习提供了支持。科技的发展还不断拓展新的研究领域,为教育内容的更新提供了源源不断的动力。

人才是这一联动机制的实践主体。高素质的人才才是科技创新的关键,他们不仅在科研机构中从事基础研究和应用研究,还在企业中推动技术创新和成果

转化。人才通过自身的实践,将教育中获得的知识和技能应用于实际工作中,从而推动科技的发展和社会的进步。

增强教育、科技、人才融合发展的成效聚合性。成效聚合性是衡量一个系统内部不同要素、因素或变量之间相互作用所产生的综合效果的重要标准。这种聚合性不仅体现了系统内部各要素之间的紧密关联和相互促进,更揭示了通过优化组合和合理配置,可以创造出更大的价值和影响力。这意味着,我们不能仅仅满足于教育、科技、人才各自领域内的独立发展,而是要通过深度的互动和协同,激发出各要素之间的化学反应,产出超乎预期的协调效应。

首先,要深化教育改革的力度,提升教育的质量和效率。通过不断改革教育模式,引入先进的技术手段和方法,提高教育的针对性和实效性,为科技创新和人才发展提供坚实的基

其次,要加强科技创新的推动力度,提升科技对教育和人才发展的支撑作用。科技不仅是推动社会进步的重要力量,也是提升教育质量和效率、促进人才发展的重要手段。我们需要加大对科技创新的投入,鼓励原创性研究和突破性创新,为教育和人才发展提供源源不断的动力。

最后,要优化人才发展的环境,提升人才的创新能力和竞争力。人才是教育和科技发展的核心要素,其创新能力和竞争力直接影响到整个系统的成效聚合性。因此,我们需要构建更加开放、包容、灵活的人才发展环境,激发人才的创新活力,提升人才的综合素质和竞争力。

【作者为温州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副教授】

浙江省新春第一会强调推进高水平对外开放,建设高能级开放强省。不断扩大对外开放、提高对外开放水平,以开放促改革、促发展,是我省发展不断取得新成就的重要法宝。20多年来,浙江始终坚持以“八八战略”为指引,坚定不移扩大开放,开放能级不断提升,实现了从资源小省向外贸大省、从外贸大省向开放大省、从开放大省向开放强省的三次历史性跨越,实现了以开放促改革、促发展。

制度型开放是建设高能级开放强省的必然要求。2023年9月,习近平总书记浙江考察时指出,“以服务全国、放眼全球的视野来谋划改革,稳步扩大规则、规制、管理、标准等制度型开放”。在省部级主要领导干部学习贯彻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精神专题研讨班开班式上,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坚持改革和开放相统一,稳步扩大制度型开放,主动对接国际高标准经贸规则”。制度型开放具有鲜明的时代特征,是开放水平发展到一定阶段的必然结果,是深化改革与扩大开放深度融合的必然要求。在浙江实现从开放强省向高能级开放强省新的历史跨越中,推进制度型开放是重要内容和应有之义。

以自由贸易试验区为抓手稳步扩大制度型开放。相比传统开放方式,制度型开放不仅局限于削减关税、去除非关税壁垒等,而更加强调规则、规制、管理和标准等制度层面的变革。也就是说,制度型开放更加强调对标发达国家高标准国际经贸投资协定,重视从边境上开放向边境内开放延伸。党的十八大以来,自由贸易试验区建设逐步上升为国家战略,成为国家层面统筹推进制度型开放的重要平台。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强调,实施自由贸易试验区提升战略,鼓励首创性、集成式探索。自2017年成立、2020年扩区以来,中国(浙江)自由贸易试验区形成舟山、宁波、杭州、金义“一区四片”发展格局。近年来,作为改革开放的先行地,中国(浙江)自由贸易试验区在制度型开放的实践探索上取得显著成效,形成了一批可在全国复制推广、具有示范引领作用的制度创新成果。2024年3月,浙江省商务厅等部门印发了《关于推动浙江自贸试验区制度型开放若干意见》。要进一步统筹好有效市场与有为政府的关系、开放发展与安全稳定

孙雪芬

的关系,主动适应国际经贸规则重构新动向,创新利用外资、做大外贸的方式方法和渠道,进一步稳步推进自由贸易试验区制度型开放。

基于“五大功能定位”全方位多领域联动探索制度型开放。中国(浙江)自由贸易试验区被赋予以油气为核心的大宗商品资源配置基地、新型国际贸易中心、国际航运和物流枢纽、数字经济发展示范区和先进制造业集聚区“五大功能定位”,基于这“五大功能定位”,联动“一区四片”全方位探索制度型开放。以全国首个大宗商品资源配置枢纽建设为契机,持续推动油气、铁矿石、铜精矿、粮食等大宗商品投资贸易自由化便利化,积极推进大宗商品储运、加工、贸易、交易全产业链发展,不断深化大宗商品全产业链制度型开放。要主动把握义乌新一轮国际贸易综合改革深化的战略机遇,推动贸易方式、贸易业态迭代创新,深化新一轮外贸外资体制机制改革。进一步放大自贸试验区、全国首个跨境电子商务综合试验区、国家服务业扩大开放试点叠加效应,大力探索数字经济和数字贸易领域开放,推动完善数据要素市场和跨境数据流动,构建“三数一链”数据可信流通基础设施框架和数据要素治理体系。基于《杭州市数字贸易促进条例》,在更大范围内探索数字经贸领域对标《数字经济伙伴关系协定》(DEPA)等高标准数字经贸规则。

在高水平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建设中协同推进制度型开放。从制度型开放的具体内容看,其更加关注开放国家自身市场化改革的发展和完善程度,更加强调市场主体在知识产权保护、劳工保护、环境标准等相关规则上的国际对接,更加关注开放国家在市场准入、政府采购、国有企业、金融服务等方面的规则一致。因此,制度型开放同样要着力于向内推进市场化改革,重视清理完善不符合高标准市场体系的相关规则规制。党的二十大报告提出,构建全国统一大市场,深化要素市场化改革,建设高标准市场体系。完善产权保护、市场准入、公平竞争、社会信用等市场经济基础制度,优化营商环境。这些与基础经济制度相关的改革内容,既是加快构建高水平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重要内容,也是制度型对外开放的重要内容。可以说,制度型开放与高水平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是内在一致的,其改革的核心都在于更好处理好政府与市场的关系。作为市场经济大省,通过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基础制度的完善,引领全国统一大市场建设,有助于进一步提高浙江的市场活力和效率,进而推动实现相关制度的向内自我开放。

在制度型开放实践中着力提升全球经济治理能力。制度型开放是构建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新发展格局的必然选择,是提升国际循环质量和水平的关键所在。其与传统开放方式最大的不同在于,制度型开放更加注重深层次的制度变革,不仅着眼于推动国内制度与国际制度的对接转型,更加强调本国制度的对外开放及其国际影响力,以此提升本国参与全球经济治理的能力。近年来,全球经济体系发生深刻变革,国际分工格局深度调整,全球经济治理方式、治理体系、治理制度等都发生较大变化,对我国在推进中国式现代化进程中的全球经济治理能力提出了更高要求。在自贸试验区“一区四片”的制度型开放实践中,着力扩大国际公共产品和公共制度供给,“加快提升资源配置力、全球辐射力、制度创新力、国际竞争力”,“增强对外开放话语权、定价权、规则权”,为提升我国在国际经济治理体系中的制度性话语权作出浙江贡献。

【作者为浙江省委党校“八八战略”创新发展研究院研究员、衢州市委党校校委委员】

宏观经济政策调整的四个关键点

上海财经大学校长、中国人民大学原副校长刘元春近日在CMF宏观经济月度数据分析会上指出,中国宏观经济调控正初步完成第一阶段的任务,开始向第二阶段迈进。

刘元春分析说,一般而言,一个大规模经济体的宏观经济深度调整 and 治理分为三个阶段。第一阶段,以治表与治标为主,直接对冲经济下行的压力,解决宏观经济出现的“低温症”问题,阻止宏观经济指标过度回落,避免系统性风险的爆发。第二阶段,在“低温症”得到缓解的基础上进行对症下药、标本兼治。第三阶段,在精准施策的基础上对体制机制进行深度的、大幅度的调整,从根本上解决本轮经济深度调整中暴露出的各种深层次问题,使经济发展步入到新均衡轨道之中。

刘元春强调,在当前政策组合持续加力方面,应着重把握以下四个关键点。

第一,积极的财政政策是市场关注的核心和深度治理的重要支柱。实施更加积极的财政政策不宜过度关注赤字率,而应更加注重广义财政支出的增长速度,2025年和2026年广义财政支出的正增长是更加积极的财政政策的核心,

因为,当收入端出现下滑和收缩时,仅以赤字率为核心来衡量政策的积极性并不准确。我们应从市场主体的实际感受出发,重新定义财政政策的“积极”内涵,这一内涵体现在广义财政支出的正增长之上,其增长速度应与名义GDP的目标增速(约5%)相匹配。

第二,实施积极的财政政策必须辅以更加积极的货币政策进行配合,货币政策的宽松和积极对于防止经济“低温症”、避免通缩具有同等的重要意义。

第三,当前的逆风向因素将持续较长时间,所以,更加积极的宏观政策必须具有跨年度的视野,最好能够以两年的时间跨度对各项指标进行系统安排,同时向市场释放更加积极和持续的政策信号。这有助于消除市场对政策稳定性的担忧,进一步增强市场信心。

第四,更加积极的财政政策与货币政策的落脚点不宜过度泛化,必须集中在基础性和根源性的问题之上,保持内需名义增长持续扩充的同时,必须聚焦于房地产的调整与治理之上。稳房地产是中国稳信心、稳预期和打破恶性循环的关键,超常规出台房地产救助政策和改革措施在宏观治理第二阶段十分关键。